



楚系出土文献語言文字考論

楊建忠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學出版社

楚系出土文献語言文字

楊建忠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楚系出土文獻語言文字考論 / 楊建忠著. —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308-14052-2

I . ①楚… II . ①楊… III . ①古文獻學—研究—中國
—楚國(? ~前 223) IV . ①G256.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265584 號

楚系出土文獻語言文字考論

楊建忠 著

責任編輯 胡 畔 (llpp_lp@163.com)

封面設計 春天書裝

出版發行 浙江大學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號 郵政編碼 310007)

(網址 :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開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張 30

字 數 560 千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308-14052-2

定 價 68.00 圓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裝差錯 負責調換

浙江大學出版社發行部聯繫方式 : (0571)88925591; <http://zjdxcbs@tmall.com>

本書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資助（“基於楚系出土文獻的上古楚方言史研究”11YJC740126）、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一般青年項目（“楚系金文語言研究”10CGZY04YBQ）成果



序言一

楚系出土文献的研究，自從 1998 年 5 月《郭店楚墓竹簡》出版以來，逐漸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利用這些新材料，在文字、音韻、訓詁、思想史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可觀的成就。以後者為例，美籍學者杜維明說：因郭店楚簡的問世，中國思想文化的歷史可能要重新改寫。他還以《論語》裏的“仁”字郭店簡作“息”字為例，闡釋說：“‘仁’不僅僅是‘二人為仁’，是人與人之間的外部世界的關係，而且是主體心性的自我追求與身體力行的實踐理性的結合。”在語言文字方面，以音韻為例，最早用這些新材料作系統研究的，是北京大學中文系張雙棣教授指導博士研究生趙彤，他的論文《戰國楚方言音系》是 2003 年答辯的，但遲至 2006 年才幾經修改，反復打磨而成，收入《中國高校百部優秀社科專著文庫》出版，可見審慎之至。一是秉承曾任南京大學校長曲欽岳（1984 至 1997 年在任）教授“研究生導師要把學生引向本學科的前沿”的教誨；二是學習、仿效雙棣教授鼓勵學生碰硬、創新的做法，允贊建忠選了《秦漢楚方言韻部研究》（南京大學，2004）。建忠在浙江大學當博士後期間（2005—2008）又在黃笑山教授的指導下將論文整飭拓展，衍為《秦漢楚方言聲韻研究》，2011 年已由中華書局出版。今觀建忠新著，由楚簡拓展至金文語言研究，可獲子目並各家如下：“著錄”有羅振玉等 13 家，“工具書編纂”有容庚等 3 家，“專題研究”有孫詒讓等 16 家，“構形和斷代分期”有趙誠等 7 家，“通假字研究”有馬曉琴等 3 家，“形聲字研究”有許文獻等 2 家，“詞彙研究”有趙鵬等 4 家，“語法研究”有管燮初、張玉金等 5 家，“語音研究”有余迺永等 13 家，“上古音用韻”有羅江文 1 家，“上古音楚音”有董同龢等 11 家，“上古語音專題”有陳初生等 2 家，“上古音韻讀研究”有王國維等 6 家，“補正上古音”有曹兆蘭等 2 家。真可謂“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一個世紀以來，尤其是新時期以來的學術舞臺，精彩紛呈，目不暇接，各家總有自己的特色耀眼之處，令人傾心激賞。但作者所看到是，“利用楚系金文作系統而全面的語音研究仍甚少或根本沒有”，“若要取得突破，須進行分期分域研究，甚或對某一字、某一諧聲系列進行研究，從中剝離出各地之‘方音造字’，甚至還要與少數民族語言進行比較，始可得窺古方音之一斑也”。遍觀群籍，洞若觀

火，何處突破，指處藏機。學術史的鋒銳或在於發現已不易發現的問題，使“問題意識”一般能落到實處，具體明確下一步的走向。

建忠的新著《楚系出土文獻語言文字考論》是學術史性質的，時人常恐學術史的研究是非本體性的。這一擔心其實是不必要的。黑格爾在談到哲學和哲學史的分野時曾說：“哲學史本身就應該是哲學的。”這就是說，作為某一門類科學的學術史與門類科學本身是有共同性、互通性的；馬克思曾反復強調“哲學是在哲學史之後”，更可知學術史地位的重要。建忠的著論分七章，第五章是對上古楚方言性質的再次考證，從題目看，就可知對本體性、本真性的追求十分明顯。建忠 2009 年曾發表《上古楚方言性質考論》，提出上古楚方言是漢語的方言而非少數民族語言的觀點。2010 年清華簡第一冊公佈，內有《楚居》一篇，書寫工整，是典型的楚文字，內容主要敘述自季連始到楚悼王共 23 位楚公、楚王的居處與遷徙。因出於楚人追溯本族史事，可信度高，彌足珍貴。篇內既然有“楚人”何以爲“楚人”及遷徙過程，這對於研究楚方言的性質亦有重大價值，故又循此來繼續研究楚方言的性質。建忠說，他所說的上古楚方言指戰國及戰國以前的楚方言，時間斷限明確。至於空間地域，由清華簡看楚人或楚族的來源及遷徙，楚人出自中原華夏腹地，其列舉的地名有喬山等六地。在引用李家浩、何琳儀、李學勤、高宗文、趙平安、黃錫全、周振鶴諸家的考證成果並予置辯之後，作者說：“從可考的地名看，楚人先祖季連始降的驃山或鄖山即今河南新鄭、密縣一帶，屬中原。之後，楚之先人遷徙地大多在河南、湖北、陝西三省相鄰的區域，由此可見，其初始的活動範圍在中原華夏腹地之內。”至於世系，作者將《楚居》與《史記》、《大戴禮記》、《楚辭》等相比勘，認爲“《楚居》所載楚人遷徙活動的範圍在中原，史書記載楚人出自顓頊，以此推斷，楚人爲中原華夏之後裔，亦或與中原華夏有莫大的關係”。原本意而立我意爲主軸，更以他意證我意，繼以我意直逼本意本真。

正因爲建忠在學術史的視域內發現了楚系金文研究不夠，故有針對性地對楚系金文釋文作了比較。文中選擇劉彬徽、劉長武、李零、鄒芳都三家，因三家著論體例不一，難以直接比較，只好齊一於劉氏一家“東周一期至七期”，按劉氏的釋文的體例、楚系金文，檢尋比對，同一器件，文字相應，形成統一的比較系統。完成這一設計，並以金文識別、釋讀、字形摹寫、字形系統成批量排列爲基本功貫穿於比較全過程，實屬不易。細檢該書，東周一期至七期，並含先行比較示例和補白，共列 335 件器。編纂整一，器件字字，魚貫相應，次第不亂，作者按語時見，每有識力和功夫。如東周二期 15 號“楚子某”字的比對辨證，東周四期 60 號隸定爲“賓”字，東周五期 97 號爲辨證“造”字，列出“告”字和“造”字的古文字 43 個，東周六期 104 號爲辨證楚文字“歲”字，擗出古文字 24 個，等等，皆有可觀。

利用甲金文字等古文字來研究上古語音系統，通假字是重要切入點。原因是

從發生學看通假字總是緊係活語言，從本體論看通假字通在語音層面。作者的做法不是重複時彥先進的做法，從楚系金文中重新一一確立通假字，而是在別人成果的基礎上再研發，再創造。書中以劉彬徽《楚系金文彙編》為基礎，整理出楚系金文中的通假字 290 組，然後分別與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白於藍《戰國秦漢簡牘帛書通假字彙纂》等對照，來確立楚系金文通假字的歷時與共時層次，以期進一步研究其所反映的楚方言音韻信息。對照當然是全面的，但作者確定了 22 對楚系獨有的通假，卻彌足珍貴。總之，對照作業做得字字廣披，不時獵新。“廣披”之例，如：乍/作，本組通假字在甲骨、金文中即已出現，楚系金文、戰國秦漢簡牘帛書中亦有，但似以楚系文獻中居多，本組通假不限於楚系，時間上從兩周金文到戰國秦漢時期均當存在。“獵新”之例，如：彖/渠，由王輝、朱德熙說可確定，本組通假僅見於楚金文，時間上在西周時期。既有 290 組和 22 對的功夫，楚系金文時代的語音系統的描寫遂成可能。從通假切入到語音系統描寫，我再次看到建忠在南京大學時早就顯現出來的聰明睿智，經在浙江大學和復旦大學的再鍛造，檔次和正規化程度又大不一樣了。笛卡爾曾說，任何科學都不過是人的“普遍的智慧”，以建忠其人看其書，難道不是這樣嗎？特別是他留別南京大學十年後再相約相遇，見本書諸如體制機關、材料選擇、內容關聯等，正可以“聰明”二字括之。

上古音中的[-m]尾問題，歷來為音韻學界所重。從書中看，作者簡直有志於要寫一部[-m]尾轉化史論。呈現出的成果，表明作者在中、上古韻尾系統中考察了[-m]尾，調查了 31 種文獻，製成了[-m]尾消變時間、地域表，並集中精力從春秋楚系金文、戰國楚簡、秦漢楚方言看楚方音中的[-m]尾和[-n]尾，特別是從楚系金文通假字看[-m]尾和[-n]尾，進而尋找[-m]尾轉入[-n]尾的音理機制，乃至聲學原理。幾乎將經驗事實的物件研究推到了極致，甚可貴！但不足之處，是否可以關注一下當代以鄭張尚芳為代表的新派音韻學成果和境外音韻學家的研究成果呢？例如，鄭張尚芳（1987）、白保羅（1992）、丁邦新（1994）都曾研究過鼻音韻尾與聲調的關係。鄭張（2003）還研究過上古音構擬的新進展對文字學的意義，並由上古音形式明白今音原來是上古複聲母後半部分墊音的遺留。這些，對[-m]尾和[-n]尾的研究是會有啟發的。學術既無禁區，亦無國界，唯是是從，唯真是求，誠此謂也！

建忠的書成稿後允我先睹，並意問序，今不揣謬陋以敘之，以與建忠共勉並求教於學界。

李開

2014 年 8 月於澳門科技大學

序言二

二十世紀以來中國進入了大發現的時代，我經常提到用來形容這一時代的八個字就是“山川呈瑞，地不愛寶”。在這大發現時代出土的“瑞”和“寶”中，在故楚地出土的楚文字資料，可以說是蔚為大觀。尤其因為文化發達，學術昌盛和利於保存的氣候、環境和埋藏方式等原因，使得戰國楚簡在出土戰國文字資料中一枝獨秀，獨領風騷，佔得霸主的地位。

“楚文化”研究本來就是考古學研究的一個熱點，而楚國出土資料的不斷面世，對這一研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楚國出土資料為我們提供了許多有關楚國歷史的新知，豐富了我們對楚國歷史的認識，修正了以往一些模糊的觀念；楚國出土資料讓我們看到了早期儒道思想的關聯和糾葛、儒家子思一脈思想的演變、黃老道家的流行、術數觀念的影響，更正了一些諸如“五行”等概念的內涵；楚國出土資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內涵豐富的語料庫，讓我們對戰國文字中最大宗的楚文字的構形和演變有了更全面的體察，對楚文字所反映的楚地的詞彙和音韻狀況有了更為深入的思考。

在上述“楚文化”研究的歷史、哲學和思想、語言三大門類中，語言研究中的文字研究積累最多，進步最大。而有關利用楚文字研究上古音的課題和成果，學界雖然也有了一定的積累，但是像楊建忠先生這本《楚系出土文獻語言文字考論》這樣，將古文字和音韻結合得如此深入和全面的論著尚不多見。

楊建忠先生《楚系出土文獻語言文字考論》一書由七章和兩個附錄構成。七章就相當於七篇自足圓滿的文章，但是文章與文章之間有關聯，有承續。其中第一、二、三、四章是利用出土楚系金文對有關楚地語言，尤其是音韻研究的綜述、總結和分析。第五、六章是利用楚簡和所有楚文字資料針對兩個個案進行的勾稽和分析。第七章所用材料不限於楚文字，而是從整個古文字研究的角度，對利用古文字資料研究上古音進行的反思。

有關利用出土楚金文研究語言和音韻的四章是本書的主體，這四章的特點是資料宏富，論述詳密，評價公允，按斷精審。既可當作資料長編，作為進入這一

研究領域的階梯，同時又可作為重要的研究參考，從中體會作者自己的評判和按斷，以及在總結和歸納基礎上的分析。利用楚文字資料研究上古音，其難點在於如何充分利用古文字考釋的最新成果，並結合上古音研究的最新進展進行整合和分析。對一個年輕學者來說，同時掌握這兩方面最新的進展是有相當難度的。而從本書這幾章內容來看，楊建忠先生是基本做到了。尤其在有關楚系金文通假字整理的標準方面，作者提出的八條標準富有新意，值得關注。

第五、六兩章是深入的專題研究，其中第五章研究的是楚方言的性質，作者的結論是，楚方言應該屬於“蠻化夏語”，即華夏語的方言。這一結論，是作者通過對出土楚文字資料的全面深入的分析後得出的。第六章探討的是楚系出土文獻的[-m]韻尾的演變。

第七章是本書最重要的一章，作者指出的一些問題值得利用古文字資料研究上古音的人思考。作者揭示出的通假關係的複雜性和諧聲字的複雜性，一些具體的通假關係和諧聲關係難以確定等因素，都是以往研究中容易被忽視的。作者從發展的眼光對“諧聲時代”這一提法的質疑，也頗具合理性。總之，這一章的理論觀點對於利用古文字資料的上古音研究，具有相當的指導意義和啟發性。

作者在後記中總結了本書中提出的一些主要看法，這些看法是：“僅據通假不足以治古音”、“上古楚方言是蠻化夏言”、“諧聲時代是個偽命題”，“-m 併入-n 而未併入-ŋ，與其自身的聲學特征有關”、“利用古文字治上古音，需分時分域，甚至具體到每個字、每個諧聲系列來研究”等。其中的大部分提法我都非常贊同，也相信能得到學術界的重視並引起進一步的討論。

楊建忠先生學音韻學出身，曾親聆魯國堯、李開、黃笑山等名師的督教，故能見賢思齊，學有所成。近年又對古文字產生濃厚興趣，孜孜矻矻，寢饋其中，眼見已登其堂奧，漸入佳境。其博士論文《秦漢楚方言聲韻研究》已於 2011 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備受學界關注。其中利用古文字資料研究楚方音的範式和方法日臻成熟。如今這本《楚系出土文獻語言文字考論》也將付梓，這將進一步奠定楊建忠先生的學術方向和學術地位。相信這本書一定能與《秦漢楚方言聲韻研究》一樣，受到學界的歡迎。我將樂觀其成。

劉 剑

2015 年 4 月於上海

目 錄

序言一	(1)
序言二	(1)
第一章 金文語言研究述評	(1)
一、著錄	(2)
二、工具書編纂	(3)
三、專題研究	(4)
(一)文字	(4)
(二)詞彙	(9)
(三)語法	(9)
(四)語音	(10)
第二章 楚系金文三家釋文比較	(21)
一、東周一期	(24)
二、東周二期	(29)
三、東周三期	(35)
四、東周四期	(59)
五、東周五期	(70)
六、東周六期	(88)
七、東周七期	(100)
八、補編	(121)
九、劉鄩互無之器目對照表	(136)
十、關於分期	(139)

第三章 楚系金文通假字歷時與共時研究	(141)
一、楚系金文通假字整理的標準	(141)
二、楚系金文通假字共時研究	(150)
三、楚系金文通假字歷時與共時研究	(153)
第四章 楚系金文通假字音韻研究	(267)
一、聲母研究	(267)
二、韻部研究	(271)
三、楚系獨有通假字音韻研究	(277)
第五章 上古楚方言性質再證	(283)
一、由楚簡看楚人的來源及遷徙	(283)
二、由卜辭看楚人的來源與活動範圍	(287)
三、由語言本身看楚方言的性質	(290)
第六章 基於楚系出土文獻的[-m]韻尾演變考	(292)
一、上古及中古漢語韻尾	(292)
二、[-m]併入[-n]的起始時間及地域分佈	(294)
三、楚方言中的[-m]尾與[-n]尾	(297)
四、楚方言中的[-m]尾與[-ŋ]尾	(300)
五、[-m]併入[-n]而非[-ŋ]原因初探	(303)
第七章 利用古文字資料研究上古音的反思	(305)
一、引言	(305)
二、通假關係的複雜性	(307)
(一)通假關係較難確定	(308)
(二)通假關係的歷史性	(311)
(三)通假關係的地域性	(312)
(四)通假關係語音標準再思考	(313)
三、諧聲字的複雜性	(315)
(一)具體諧聲字的考釋尚無定論	(315)
(二)兩聲字如何處理	(316)

目 錄

(三)諧聲系列複雜.....	(317)
(四)“諧聲時代”志疑.....	(319)
附錄一：《楚辭解故》楚語詞表	(323)
附錄二：《楚辭》韻譜	(368)
參考文獻.....	(454)
索 引.....	(465)
後 記.....	(467)

第一章 金文語言研究述評

對金文的研究，主要集中於著錄、工具書編纂及各種專題研究（文字構形、考釋、語法、詞彙）等，李曉峰在總結西周金文語言研究的歷史與現狀時認為，金文語言文字的研究始於宋代，集中於對金文的著錄。清人尤其是晚清學者開始注重對銘文文字的考釋和研究，民國時期，學者研究的範圍和深度進一步擴展，對金文語法進行系統研究，尤其是作為一個語言系統進行研究的，是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1978年以後才開始的，研究主要集中於金文語法、詞類、句法與語序、語法史、金文字典及文選類書籍五個方面。^① 對戰國金文的研究，主要集中於著錄、字典編纂、分域和斷代研究、文字考釋及理論研究五個方面。^② 對楚系金文的研究，也大致集中於著錄、工具書編纂及各種專題研究如文字、詞彙、語法、語音幾個方面。因在一些研究中，並未專門針對楚系金文，只在全面研究殷商甲骨、兩周金文或春秋金文時把楚系金文納入其中，故本文在研究現狀述評時不局限於以楚系金文為題目者。

黃靜吟《楚金文研究》曾指出：“楚文字與楚系文字有別，二者差異之處，在於楚文字單指楚國一國之文字資料；楚系文字則以整個楚文化圈的文字資料為範圍，以楚國為主，也兼及其他文化圈內的諸小國，如吳、越、曾、蔡、徐、江、息……等小國。所以說，楚系文字的範疇大於楚文字，楚文字是包含於楚系文字的範疇之內的。”^③

對於楚銅器銘文的研究，李守奎指出，有以下問題尚待解決：（1）一些疑難字尚待進一步研究。（2）一些自稱“申公”、“鄧公”之類的器銘究竟是申、鄧諸國之器，還是楚之封公之器，需結合器形、年代深入探討。（3）楚國銅器銘文各個時期

① 李曉峰：《西周金文語言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8年第6期，第83—86頁。

② 樊俊利：《戰國金文研究概述》，《山西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第50—55頁。

③ 黃靜吟：《楚金文研究》，臺灣“中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97年，第17頁，腳注2。

文字結構、書寫風格均有不同。對各個時期的文字應當做深入細緻的斷代描寫，以見楚文字演變的過程。(4)應當以楚銅器銘文為對象，編著一部文字編，以見楚銅器銘文字形的全貌。對於李氏提出的第3點，鄒美都已有初步研究；李氏提出的第(4)點，劉彬徽、劉長武先生已有編著。

一、著錄

楚系金文的著錄，實始於宋代。如楚公逆鐘著錄於趙明誠《金石錄》和《古器物銘》，楚王臘邛仲嫗南鐘、王子良鼎、楚王會章鐘見於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晚清時期，約有二十餘件楚器被著錄，重要者如楚公彖鐘、王子申盞著錄於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中，王孫遺者鐘著錄於《窓齋集古錄》中，中子化盤著錄於《筠清館金文》中。民國時期，對楚系金文的著錄更加全面，著錄楚器較全者有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和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大系》著錄12件楚器，而《三代吉金文存》“於楚系有銘銅器而言，此前所能見者均盡收其中，為其研究提供了極大的方便”^①。新中國成立後，在此前著錄的基礎上，于省吾《商周金文錄遺》、徐中舒《商周金文集錄》及60年代考古研究所編的《美帝國主義掠奪我國殷周青銅器集錄》、《楚器圖錄》、《楚文物展覽圖錄》、《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等對楚系金文均有著錄。日本學者白川靜及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也收錄一些戰國時期的銅器銘文。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對散見於《文物參考資料》、《文物》、《考古》等刊物的楚器有所匯集。80年代始，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編輯《殷周金文集成》等大型圖書，是真正對楚金文展開全面收錄的著作。該著共18冊，收錄青銅器共11984件，是金文著錄的集大成之作。1994年前所能見到的有銘楚器均可在此書中查閱，但該著未對每器標注國屬，也未給出釋文，故若於其中檢索楚金文，除需結合其他學者研究成果外，尚需自己判斷。後出《殷周金文集成釋文》，按照《集成》十八分冊順序號排列，共計六卷，其中對傳世著錄器物去偽存真，糾正錯誤，是一部翔實準確的先秦青銅器銘文資料彙編。

劉彬徽《楚系青銅器研究》收錄108組楚金文，之後劉彬徽、劉長武《楚系金文彙編》“正編”收160器656.5件，“補編”收60器62件，“附編”收有“曾侯乙編鐘鐘架和掛鐘構件文字”、“曾侯乙編磬銘文”、“楚貨幣文字”。“正編”有“楚系金文器目一覽表”，把楚系銘文分為東周一期（公元前770—前670年）、東周二期（公元前670—前600年）、東周三期（公元前600—前530年）、東周四期（公元前

① 鄒美都：《楚系銘文綜合研究》，巴蜀書社2007年版，第8頁。

530—前 450 年)、東周五期(公元前 450—前 380 年)、東周六期(公元前 380—前 300 年)、東周七期(公元前 300—前 223 年)共七期。在東周一前期尚有楚國君熊渠時代(在位年代約當西周夷王、厲王之際,即公元前 878 年前後)的“楚公蒙鐘”5 件與“楚公蒙戈”1 件;熊鄂時代(公元前 799—前 791 年)的“楚公逆鐘”2 件。該表詳細列出每件楚系器物的字數、年代、出土時間地點、收藏單位、銘文著錄號及圖像來源與備注,極便學者查檢。李零《楚國銅器銘文編年匯釋》對楚系銘文也有收錄,鄒美都《楚系銘文綜合研究》收錄楚系青銅器共 165 號(組),對每器的銘文進行考釋並進行年代考訂。

二、工具書編纂

容庚《金文編》,是其成名作,深得羅振玉、王國維二先生賞識。該著至今已出四版,是 2011 年《新金文編》出版之前最新的金文字彙,反映了 20 世紀 80 年代所見金文字形及其研究成果,趙誠先生《後繼有人——〈金文編〉終於出版》(《中國語文研究》1986 年第八期,第 119—122 頁)曾詳列其優點。同時,趙先生指出其缺點是:字形為摹寫,雖清晰但可能有失真;對異構字未加區分。劉釗先生《評〈金文編〉》則專列其缺點,並輔以豐富例證,計有考釋錯誤、不明假借、兩字混列、當釋不釋、隸定錯誤、割裂形體、說解錯誤、遺漏形體、不明構形、盲從謬說十類問題。陳斯鵬、石小力、蘇清芳編著的《新見金文字編》,收錄 2000 至 2009 年新見的先秦金文,排列次序略依大徐本《說文》,每字形均出相對完整的文例,並對疑難字或新見字,作簡要集釋,如此則甚便讀者。董連池先生編著的《新金文編》2011 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第四版《金文編》出版至今,又有大量新出土的古文字材料,古文字學也有了長足發展。學界亟須一部能夠涵蓋新材料,吸收新成果的新的金文字彙,《新金文編》在此背景下編寫。該書專門收錄截至 2010 年年底前發表的商周(至戰國末)期間鑄刻在青銅器上的金文字形,依《說文》部次排列字頭,字頭下以時間為序排列字形(順序為:商、商或西周早期、西周早期、西周中期或中期、西周中期、西周中期或晚期、西周晚期、西周、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春秋早期、春秋早期或春秋中期、春秋中期、春秋中期或晚期、春秋晚期、春秋、春秋晚期或戰國早期、戰國早期、戰國中期或中期、戰國中期、戰國中期或晚期、戰國晚期、戰國)。時間參照原著錄上的說法,各字形為電腦上剪切原拓片而得,凡不清者附以摹本供參考。書後卷末附有部首索引、拼音索引,便於檢索。《新金文編》是迄今為止收字最全的金文字彙工具書,該著的問世,無疑對金文的研究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以上二著雖未專門針對楚系金文,但二著對目

前所見金文悉加收錄，楚系金文當然包括於內。李守奎《楚文字編》收錄 2000 年以前所能見到的楚文字，該文字編在分國文字編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對楚文字的研究有重要價值。李學勤先生評其為“將所能看到的各類材料彙聚齊備，藉以窺見楚文字全貌的，李守奎博士這部《楚文字編》實屬首見”^①。徐正考也認為它“是第一部將各種載體上所能見到的楚文字匯成一編的大型綜合文字編……是至今為止，可見到的窺知楚文字全貌的唯一著作”^②。

三、專題研究

(一) 文字

1. 考釋

新材料的出土，首先要面對的是釋讀，因此，對文字的考釋就成為整理新材料的第一要務。對楚系金文的考釋，也伴隨着楚系青銅器的出土而展開。宋代對楚系青銅器有著錄，也有文字訓詁，但成績不佳；有清一代，傳統的語言文字之學昌明，其中各個分支學科也有長足發展，清人對楚系金文的考釋也大有進步，屢有創獲，如孫詒讓釋出楚公逆鐘之“逆”即“鄂”，“楚公逆”即“楚熊鄂”，為該器的斷代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後世均信之不疑。阮元最先釋出王子申盞之“盞”，得到後世公認。民國時期，在清人基礎上，對楚金文乃至整個古文字的考釋以及方法、理論方面均有進步，此期名家輩出，創獲甚豐，如王國維、羅振玉、唐蘭、徐中舒、胡光煥等。新中國成立後，學界一方面是對傳世楚器重新釋讀，另一方面對新出楚器進行考釋，除民國時期多數學者仍繼續研究、考釋外，此期新成長的古文字學者與老一輩文字學者如朱德熙、裘錫圭、張政烺、于省吾、張振林、劉彬徵、黃德寬、李零、李家浩、劉釗等等，此期古文字學隊伍強大，人員鼎盛，學術繁榮，成果卓著。

2. 構形

對文字構形的分析與研究，最早可追溯到許慎的《說文解字》，之後此研究代有其人。1899 年甲骨文被發現，更是引起古文字學界對漢字構形及相關理論的全面探討。如探討漢字構形的六書說、三書說、新三書說、新六書說，針對金文或

① 李學勤：《楚文字編·序》，載李守奎《楚文字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 頁。

② 徐正考：《一部楚文字研究的力作——評李守奎博士的〈楚文字編〉》，《煙台師範學院學報》2004 年第 2 期，第 128 頁。

楚系金文的構形研究，大略有姚淦銘《論西周銅器文字演變的軌跡》、《論兩周金文形體結構演變規律》，曹永華《西周金文構形系統研究》，趙誠《西周金文構形系統二重性探索》、《西周金文構形系統二重性續探》、《西周金文構形系統二重性再探》，認為金文文字系統中的組成部分，既有同於甲骨文的，也有不同於甲骨文的，這就是金文構形系統的二重性。趙先生共舉 13 例加以證明：(1) 甲文“農”是“晨”，金文“農”是“農”；(2) 甲文“晨”作“農”，金文“晨”早期作“辰”；(3) 甲文“勿”作𠂇或𠂇，金文中勿作𠂇或𠂇，甲文中也有一個𠂇，或作𠂇𠂇𠂇，為“犁”之初文，因構形與金文勿同而被誤作“勿”；(4) 甲文以“有”表“有”，金文則用“彖”表示；(5) 甲文“𠂇”為“替”的古代寫法，表“廢”義，金文用“灋”表“廢”義；(6) 甲文“因”作“𠂇”，金文作“𠂇”，構形不同，意義也不同；(7) 甲文以“𠁧”表“並”義，金文無此字，但有从兩立相並的字，其義與甲文義近似，然甲文亦有一从兩立相並之字，其義有四，與金文不同；(8) 甲金文均有“亡”、“舞”，但它們形、音、義均不同；(9) 西周金文有一“徯”，又有一“徯”，即“徯”，為繁簡關係，甲文有“徯”，構形與金文“徯”同，但非一字；(10) 金文表清晨義的“朝”作“𦨇”，甲文作“𦨇”，一右从水，一右从月，構形之意有別；(11) 甲文“莫”一般作𠂇、𠁧、𠁧，象日在草木叢中，表“暮”，西周金文“莫”作“𠁧”，雖與甲文構形基本相同，但西周金文僅見用作人名或地名，未見用作“朝暮”之“暮”，西周金文一般用“朝夕”表“朝暮”意；(12) 甲文有一表祭名的“𦨇、𦨇、𦨇、𦨇”，四字僅繁簡之別，西周早期金文有一“𦨇”，構形與甲文第一字近似，但不用作祭名；(13) 甲文“衣”多作“𠂇”，亦有少數作“𠂇、𠂇”，西周金文僅見構形同於“𠂇”的“𠂇”，未見作“𠂇、𠂇”形者，在“衣”基礎上形成的“裘”，甲文作“𠂇”或“𠂇”，以西周金文構形系統特色及現實看，其“裘”本作“𠂇”，但被借作尋求、追求、乞求之“求”，久借不歸，故另造“𦨇”表“裘”。在《探索》一文中，趙先生大致分析了金文構形系統二重性產生的原因：殷商、西周時期，正處於漢字交流、調整、完善、融合的過程中，各自保留有自己先前形成系統時的特色，並在融合中產生一些共通之處，當屬正常現象。何況殷處東方，西周之前的先周屬西方，相互靠近、交融時間不長，尚未形成完全統一的文字體系，且武王殺紂王、滅商，文字系統間的交流、融合中斷，西周文字成了主體並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自己的特別之處，其文字系統的二重性也被物化。^① 在《續探》中，趙先生進一步指出，西周金文有相當一些字的構形與殷墟甲骨文相同，但也有若干字的構形不同；另有少數的字構

^① 趙誠：《西周金文構形系統二重性探索》，《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輯，中華書局 2008 年版，第 181 頁。